

纪念父亲秦宣夫先生

秦志钰*

一

1998年1月11日中午,已卧床两个月的父亲以92岁高龄远离我们而去了。当时大姐正在为他换氧气瓶,又请来了一位主任医师为他检查。

“昨天出了许多汗,今天好些了,早上还喝了牛奶!”老阿姨报告道。可是,医生仔细一看,却发现他老人家的呼吸已如一根游丝,不久,便完全停止了。

他面色红润,神态安详如入梦境,嘴唇轻合,像是在微笑,仿佛二年前去世的爱妻——我们最亲爱的母亲李家珍女士正飘然而至,携他一同飞向那神圣的天国……

1906年(光绪三十三年)的5月,在广西苍梧县令秦恩述家里,迎来了他的第三个儿子,这是他第二个妻子多次小产后才抱下的一根独苗。这位38岁才中得举人的清贫小官,为儿子起名为善璠,字宣夫。希望他继承秦家风范,读书做官。

父亲偏偏没有与仕途结缘,却一头扑进了艺术的怀抱。

由于作武官的爷爷喜爱绘画,父亲耳濡目染,从小便爱上了绘画。14岁的父亲先就读山东省第一中学,后又考进天津南开中学。在这所著名的学校中努力学习,并在学校的美术研究会学习绘画。

品学兼优的父亲不满足于现状,念完高二就去报考众人向往的清华大学,并被外语系录取。那年他十九岁。在清华这所中西文化兼容并蓄的一流学府里,我父亲的学业知识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在吴宓先生和王文显先生以及法文老师温德教授等大师的培育下,他的外文水平达到了相当的程度。由于父亲从小喜爱美术,他在学校里还选修了外国美术史课,并且常常作素描写生,还为同学画像,至今留下的有张昌华像(已收入画册)以及罗念生像(罗先生保存至今)等。父亲说他在清华时参加过管弦乐队,拉小提琴。同时他还是合唱队的男高音。清华乐队合唱队水平很高,曾演奏过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等高难作品。

1926年他曾拜访了留法归来的国立艺专校长林风眠,林先生送他二帧巴黎邮政局印制的,他画的猫头鹰明信片。正是从那时起,他心中已萌生了留法学画的愿望。

二

1930年,乘着法国邮船,在海上漂流了35天后,父亲来到了马赛,又转到他日夜神往的

* 作者为秦宣夫三女,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

巴黎!

不久,他考上了法国国立高等美术学校素描班。第二年,又考进了印象派画家吕西安·西蒙先生工作室学习油画。同时又在卢浮学校、巴黎大学艺术考古研究所学习外国美术史。

虽有哥哥供他少量学资,但生活依然是极为简朴的,他多次跟我们谈起,在巴黎如何租用廉价公寓甚至租用画室住宿的情景。有时还需为房东太太干杂活,而吃饭经常就是咖啡、水和面包。他从未去过娱乐场所,留学几年,连交谊舞也不会跳。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学习和参观博物馆上了,因此他的学业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1933年春,他的油画《卡邦齐夫人像》入选春季沙龙,会后卡邦齐夫人收购了这幅画。父亲也第一次得到了自己挣的钱,兴奋和欣喜是不用说的,与此同时,另一件喜事是恰逢徐悲鸿先生应法国国立美术馆之邀来巴黎举办中国近代绘画展览。父亲从此认识了徐先生,还留下了珍贵的合影。这张在黄显之寓所拍的照片中的许多画家,如黄显之、唐亮、胡善余、吕斯百、常书鸿、王临乙、滑田友等都与父亲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延续一生,而他们日后也成为中国早期西洋绘画及雕塑的开拓者和传播者。

1933年4月,父亲参加了常书鸿、吕斯百、刘开渠发起的“中国留法艺术学会”,呼吸着巴黎郊外的春风,他们在游乐场一架玩具飞机旁留下了珍贵的、洋溢着青春朝气的合影。

为了广泛地吸引欧洲艺术宝库中的营养,父亲利用假期,乘上廉价的火车到各国去参观博物馆,他曾去过伦敦、米兰、帕多瓦、罗马、佛罗伦萨、庞贝、威尼斯、慕尼黑、柏林、华沙、莫斯科……饱览文艺复兴以来诸多艺术巨匠的原作,对他们的艺术风格,思想根源,绘画技巧等进行了深入的考察。

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印象派情有独钟,除了深入研究马奈、雷诺阿、皮萨乐等的作品外,还专程到梵高朋友加谢医生家,终于见到了由医生之子保罗收藏的梵高的原作,才一了心愿。

近五年的学习及创作实践,父亲已由一名绘画爱好者变成一名真正的画家兼美术史论学者。1934年即将离开巴黎的时候,他的大型油画《快乐的旋转》和《宫女》都被选入独立沙龙展出,获得一致好评。

据台湾《大未来画廊》不完全统计,民国初年的23年中(1922—1945),我国留法画家在法国沙龙展上得奖或入选展览的共有36幅,其中父亲则占三幅。可见功夫不负有心人!

与此同时,作为一位美术史论家的标志,则是1933年他与挚友李健吾先生(翻译家,剧作家)在上海《文学》杂志刊登的二万字长文:《巴黎中国绘画展》。

1931年夏,由于生病休学而晚一年毕业的李健吾来到巴黎就读巴黎大学,父亲曾一度接他到大学街大学旅社和自己住在一起。此后,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共同学习、参观名胜、探讨学问,有着共同的观点和思想。

文章一开头就尖锐地指出了中国画展不能在国内开反而到国外开,尤其是到国外才能破匣一见外国人收藏的中国古画,真是我们的不幸,“如今我们自己的珍宝也不得不往异域寻求,这不唯是国家的耻辱,更是人民的消费……难道个个富裕,能够环球一游吗?”表示出作者的一腔爱国热诚和对政府无能的遗憾。

文章又高度赞扬了中国晋唐宋元十几位画家的高超水平和尊重自然的创作方法,明确反对明清以来那种颓废文人画的“出世观的隐逸哲学和独善其身的消极退让”。

特别与众不同,两位年轻的作者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斗胆地评论了包括徐悲鸿、张

大千、齐白石在内的当红现代画家的作品，肯定了他们在主题及思想上的探索，同时又在某些技法上提出批评。虽然当时文艺批评比较自由，但这样直言不讳地批评权威的做法还是少见的。表现了作者尊重艺术规律，严谨的科学态度。

文章最后发自肺腑的喊出了要坚持“抱住人生，搂定自然，拼一个你死我活”的“入世精神”，提出“创造现代性的画家画，抛开传统因袭的文人画，是中国绘画的复兴的道路”这样的口号，勇敢地表达了青年艺术家的理想和胆识，也成为他毕生创作的宗旨！

父亲在他塞纳河边大学街大学旅社狭小的住所里，常常会见来往的学友，还常作导游陪同老师及新生参观巴黎名胜。值得一提的是1930年秋至1931年春，吴宓先生到法国、英国等地办事，来去皆由父亲去火车站接送。在巴黎期间，父亲经常陪同老师一起参观、游览、观摩，畅谈艺术及人生、爱情等问题。当时吴先生正为离婚后寻爱不果而苦恼，父亲劝他应注重过程而不计结果，为寻求冒险也不言悔，表达了他的人生观、婚姻观。吴宓先生后在日记中记录下来这些生动的情景。

1932年5月，朱自清由伦敦来巴黎游览，父亲也和李健吾、吴达元、汪封梧四人陪同朱先生游览了巴黎的名胜。后来父亲还为朱自清画了两张素描像，保存至今。

三

1934年7月，父亲经西伯利亚大铁路回到北平，他那破旧的皮箱中没有一件时髦用品，却装满了从各地博物馆和书摊上买的画册和明信片，其中一部分外国博物馆藏中国文物图册后来成为他用来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材料。

父亲回国以后，即任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素描及西洋美术史专任教员，后又任西画科主任。同时又回到清华大学任外语系讲师，教法语及艺术欣赏，把他在国外学到的知识，倾注到更年轻的学生身上。

有了这两份工作，使他能够在30岁的时候（1936年）与他钟爱的女子——北平国立艺术专学生李家珍结为夫妇。

李家珍，是赫赫有名的清朝重臣李鸿章的曾孙女，经历了家族由荣至衰的深刻苦痛，有着惊人的耐力和极高的素养，从此她辅佐父亲，风雨同舟，渡过了60年曲折艰辛，却相濡以沫、和谐幸福的漫长岁月。

重回清华使父亲能和许多教授学者重新交往、探讨学问。他与梁思成、林徽音、杨廷宝等建筑艺术大师更是有共同语言；他曾约请林为《大公报》写稿，还去过林的“太太沙龙”，并称林“是一座金矿”。更值得一提的是，1934年北平东城青年会排演了王文显先生的三幕话剧《委曲求全》，由李健吾翻译并任导演及主演之一，司徒乔、林徽音和秦宣夫三人担任舞台美术设计。排演三个月后，在协和礼堂及清华园公演，轰动了文化界。

与李健吾的友谊仍在继续。1934年李健吾写了《意大利游简》一书，在这些几年来给未婚妻尤淑芬的信简中，对意大利的名胜尽情描述。其中附了许多美术照片，并请秦宣夫写了扼要的说明文字。使这本小册子简直成了一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绘画小史！

从1935年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父亲受画家评论家司徒乔之邀，担任了天津《大公报》艺术周刊的编辑，这期间，他们约请了许多文学艺术界的名家及有识之士来写文章，研

讨中国的艺术向何处去,弘扬中华艺术的博大精深。决心把报纸办成全国最高水平的副刊,实际上也做到了这一点。当时写稿的人都是文化界精英,其中有:巴金、朱光潜、林徽音、冼星海、沈从文、李健吾、许幸之、吕斯百等等。父亲自己也发表了九篇关于西洋绘画的文章,其中《关于文西(即达·芬奇)的最后晚餐》一文,以精辟的见解和翔实的史料论据,结束了巴金和朱光潜两人就此画究竟是油画还是胶彩画的争论。

然而,动荡的局势哪里容得才子们谈论艺术,“七七”卢沟桥事变一声炮响,粉碎了父亲教育救国的美梦。

四

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使北平的学校无法生存,纷纷南迁。父亲随北平艺专去湖南沅陵,又迁到云南晋宁,直到1940年迁到重庆任国立艺专西画科主任,而傅抱石为中画科主任,陈之佛为院长。从此他与这两位国画大师又结下了深长的友谊。陈院长卸职后,父亲一度失业,由徐悲鸿先生推荐才到中大艺术系任教。1941年,他被委任为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专门委员,搬至重庆郊区磁器口凤凰山,先后与常书鸿、吕斯百、王临乙、吴作人、李瑞年等画家成了邻居,共同渡过了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

颠沛流离、国破家亡的深重苦难使父亲悲愤沉重,但他又始终充满了正义必胜的乐观信心,并在他的作品中表达出来。画中虽然少了些巴黎时期的欢乐和明快,更多出现的是凝重、庄严,但也压抑不了他对生活、对美的渴望和赞美。

《母教》、《食为天》、《幼女和菊》、《夫人像》、《白鱼》、《重庆雪》等油画以及《哭儿》、《难民》等素描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母教》因其爱国主义人道主义内涵和娴熟的画艺获第三届全国美展二等奖,画中母亲指着画报上飞机,上写:我空军阵容,巧妙地歌颂了中国空军的抗日功勋。《食为天》则是一份求生存要和平的呼吁书!画面中那怀抱吃奶的孩子,背对观众坐在条凳上的母亲顾盼着右膝旁双手捧碗的小儿,心中是何等凄然!无怪这画在展览会上很快被美国友人购走。

与此同时父亲还创作了一批色彩浓郁、地方风味颇足的四川风景和生活图景画,如《闹元宵》、《都江堰》、《峨眉山金顶》、《梯田》、《苗女》、《插秧》等,画面在浓郁中透出勃勃生机,显示出父亲对日寇必败、中华必胜的坚定信心。

艰苦的生活并没有挫倒凤凰山艺术家的锐气,反而更增进了他们的情谊。1946年初抗战胜利后不久,大家要各奔东西,父亲提议画一幅集体素描留作纪念。于是,六位画家及妻儿王合内、马光旋、李家珍、常沙娜等聚集我家,一起动笔,互画肖像,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绝品。与此前父亲用毛笔画的一幅凤凰山生活图景素描,凑成一对,几十年来一直珍藏在身边。

更令父亲快慰的是1945年底在重庆终于举办了他的第一次个人画展,徐悲鸿先生特别题了序并将这手稿赠予父亲,文中高度评价了父亲的精诣画艺和卓越学问,称之为“学者型画家”。同时,傅抱石、林风眠、宗白华、吕斯百、汪日章、张道藩等先生都在同一天撰文《大公报》专刊,给予了热情而赞赏的评价,赞之为一流画家。这是对父亲留学后十年来辛劳创作的最好回报。

五

1946年父亲来到南京,继续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解放后1952年院系调整时到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任教一直到退休。

正值中年的他精力过人,创作已进入成熟期。无论是解放战争的动荡还是后来知识分子挨整下放的煎熬,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的日子里,都没有削弱他的创作热情,更没有动摇他对艺术教育事业的忠诚。

他始终坚持歌颂社会主义的人物和山川,并且追求形式上都能出新。他创作了几幅大型油画,都赠送给了国家,其中有《毛主席像》、《向毛主席献花》、《太平军大战僧格林沁》、《庆祝国庆》、《雨花台》等。还为浦镇“二七”纪念馆等作画纪念。只可惜几幅大画在“文革”中已不知下落。

他热爱中国共产党,一直追求政治上的进步,1959年他53岁时,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作为一个几十年执教的美术教育家,早已桃李满天下,但他直到78岁时被再聘请回校教课,也和年轻时一样一丝不苟又风趣盎然。他的西洋美术史课总是爆满,不时还伴以掌声和笑声,对他的渊博学识和幽默生动的讲授天才,学生们深为折服。

由于他对西洋美术史论研究的精深,1963年被邀至《辞海》编辑部,由他修订外国美术史部分词目,证实了他在这领域的权威地位。

而他心目中最想做的事仍是画画,每逢假期,他就拿起画笔,扛起画箱,走向山川,海洋,农村,工厂。任何一张纸,哪怕是信封、包装袋、手纸甚至胸透的X光片,他都用来作画,如痴如醉,忘乎所以。寒假时,窗外大雪纷飞,他在屋内便画起雪景,或是趁女儿们有空,便成为他的模特,画我的《假日》、《大学生》以及《红领巾》、《秦志云像》等都是在假期画的。

更可喜的是在这阶段他又发展了自己的风格,在印象派技法为基础的写实主义之上,揉进了东方写意的手法和水墨技巧,两者结合得十分巧妙,浑然一体,不露痕迹。

具有代表性的是1963年赴富春江和杭州写生的一批油画、水彩以及1984年回桂林故乡的一批水粉画,无处不见他这种东西方哲学和技法相结合的风格,其中的潇洒和神韵,色彩的大胆运用,标志着他的画艺已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父亲虽然教学繁忙,但对我们四个女儿十分关心疼爱,记得小时候他曾带我们上清凉山抓蟋蟀,还坐着马车去中山陵梅花山野餐、照相。50年代的一个夏夜,我们姐妹因都爱好音乐,约了邻居闵惠芬(现是二胡演奏家)在院中开小音乐会,父亲兴趣使然,引吭一曲《饮酒歌》,令我们大为吃惊,他告之是在清华受的声乐训练。他还说,清华重视体育使他受益终生。他在学校游泳和短跑也是成绩优秀者,健康的体质使他极少生病,直到八十多岁尚能背着画箱爬山涉水。

父亲一直希望有个儿子能继承他的事业。但不幸的是我的弟弟于1948年两岁时便夭折了,他虽未能教我们四姐妹学画,但却赋予我们艺术天分,使我当了电影导演,姐姐成为钢琴教授。

改革开放以后,父亲的创作也像二度梅开。进入晚年的他凭着对艺术的率真和童心不

混。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工具材料上都有大胆的突破。1985年他的第三次个人画展上，观众欣喜地看到了他的一批个性独特的独幅水印及儿童画般的油画和水粉。其中如《家中虎》、《夫子庙灯会》、《大桥礼花》、《祝小鹿诞生》等，以天趣盎然的神态和挥洒自如的技法再次显现了他的天才和灵感。

尽管他长年定居在南京，远离文化中心北京，又历经各次运动，知名度受影响，甚至一度被淹没，但他始终不改“抱住人生、搂定自然”的人世宗旨，任何情况下都不放下他的画笔，创作了油画、水粉、版画及素描近两千幅。以他的画作表达真善美，赞美人生、赞美祖国山河的壮丽多姿。他的“巴黎画派”风格的精湛画艺越来越受到当代美术评论界及收藏界的赞扬和重视。

1990年，台湾画界为他出版了《秦宣夫画集》，并对他的作品大量宣传，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将他列为民国初年西洋绘画的开拓者之一。

1996年，他的爱妻李家珍因病去世，父亲忍住了致命的悲痛，在6月举行的秦宣夫九十华诞纪念会及画展上，将自己多年节俭的5万元献给南师大，设立了《秦宣夫奖教奖学金》，并嘱咐我们要办一个小画馆，将他的画永远向后人展示，为美术事业永远贡献光和热。

2000年北京举办的《中国百年油画展》中，他的作品《宫女》、《青岛》赫然其中，受到海内外赞扬和关注。台湾画界近年为他已开过两次画展并出版画集，许多收藏家也因能收藏到这位“三十年代闪耀法国沙龙之星”的作品而感到荣幸。

在此2006年他百年华诞之际，我们姐妹出版了他的大型绘画集，南师大出版了他的文集，又与中央美院将在北京联合主办他的画展，终于实现了他生前的夙愿。

父亲的一生是乐观奋斗的一生，是以浪漫真诚拥抱艺术的一生，是挥洒激情和才华的一生，也是热爱祖国和家庭的一生。

他那留着小胡子，仅为一米六四的精瘦而灵活的身材，黑亮的眼中永远闪动着智慧和狡黠笑意的可爱小老头形象，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